

论切支丹时代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

张 兰 星

提 要：16 世纪 40 年代，欧洲人首次来到日本，其后他们在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和经商活动，有学者称这段时期为日本“切支丹时代”。在日耶稣会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，虽然他们有一定教产，但这部分收入不太稳定。于是传教士们又冒险参与日欧之间的商贸活动，其所获利润用以补充传教经费。即便是这样，在日耶稣会的支出还是大于收入，他们始终无法解决收支失衡问题，从而对传教失败埋下了隐患。

张兰星，历史学博士，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讲师。

主题词：耶稣会 教产 贸易 收支

切支丹为日语汉字，意为基督教，更准确地说是指天主教。16—17 世纪，在日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多来自耶稣会。传教士无论在哪里传教，肯定需要经费。但在日耶稣会比较特殊，他们的教产、经费多来自捐赠和贸易。即便这样，他们的财政状况仍然不容乐观，这最终成为他们传教失败的原因之一。鉴于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特殊而又重要，中国史学界对此研究也少，故笔者试做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

日本佛教寺院通常得到大名、领主的金钱赏赐，耶稣会却很少获得这种施舍。其原因主要有几点：16 世纪的日本处于战国时代。即便大名有一定经济实力，他们也将金钱用于争霸战争，或储存起来以备后患；一些大名虽然拥有矿山、能够开采金银矿、甚至铸造钱币，但这样的大名只占少数，多数大名不富裕；大名的财富主要来自地租，虽然农民可以用货币或粮食缴租，但更多时候他们缴纳粮食。大名每年获得的粮食不多，他还必须将这些粮食分配给家臣，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武士。如果大名每年获得 50 万担粮食，那自己仅留其中 4—5 万担，其它作为俸禄分给家

臣。一名武士一年能分得 150—200 担粮食，但这只能维持基本生活。因为即便是一般武士，也要豢养 8—10 名奴仆。史学家博克舍指出：“这些粮食通常不够用，武士甚至依靠来源不稳定的蔬菜、水果度日。”^①整个日本，除了畿内的武士好过些，其它地方多为贫困状态。即便是信仰基督教的大名也好不到哪去，基督教大名大友宗麟表面上慷慨，其实也经常陷入粮食不足的窘境。

因此，并不富裕的日本大名只能以其它方式捐助耶稣会的传教活动，如献土、建房、提供免费劳力等。其实，耶稣会也乐于接受这种帮助，因为土地、房屋、劳力是他们传教的基础。1580 年，肥前大名大村氏的献土之举（长崎和茂木地区）是耶稣会在日本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捐赠。在长崎，葡船每年缴纳 1,000 库鲁扎多白银（约 1,000 两白银）的港口税，税收由耶稣会和大村分享^②（持续到 1587 年）。如果葡船停泊于茂木地区，还需另缴 300 库鲁扎多白银^③。若葡商在长崎居住，还需向耶稣会交租金。

索取外界捐赠，特别是金钱捐赠，是耶稣会解决传教经费最有效的方式。与欧洲教会相比，亚洲耶稣会财政拮据。日本的情况更是如此，大名极少捐赠金钱，更不用说贫穷的日本信徒了，

这就导致在日耶稣会只能从欧洲方面获得捐赠金。16世纪,在亚洲活动的葡人(非教会人士)偶尔施舍金钱给耶稣会。1549年,马六甲指挥官赠予著名传教士沙忽略一批物资,同时捐赠少量金钱。1587年,印度总督D·杜阿特·德·孟勒斯(D. Duarte de Menezes)捐赠了2000库鲁扎多白银给在日耶稣会,他还保证每月提供200库鲁扎多白银及4匹马给耶稣会^①。耶稣会与葡萄牙王室关系密切,葡王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传教。在日耶稣会得到的第一笔王室捐赠来自葡王约翰三世。约翰在位期间(准确地说从1554年起),每年寄500库鲁扎多白银给马六甲指挥官,然后由马六甲方面转交给耶稣会。这笔捐赠金不必交税。1574年,葡王塞巴斯蒂安将经费提高到每年1000库鲁扎多白银,经费并非王室直接拨出,而是从马六甲的税收中抽出。1580年,葡王“红衣主教亨利”延续了塞巴斯蒂安的捐赠金额,并称这笔捐赠金至少会延续5年。1585年,西葡国王(西葡合并)菲利普二世继续执行亨利的捐赠标准,并将时间再延长5年。

为了鼓励向亚洲传教,教皇也多少施舍一点。耶稣会在日传教期间,几乎每位教皇都拨款资助。16世纪80年代,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捐赠了4000杜卡特白银,捐赠金来自西班牙教会上缴的税收。不过,在日耶稣会只能收到2800杜卡特,有30%要被扣除。教皇宣称每年都寄出经费,但日本教会方面并非每年都能收到。1585年,教皇西克图斯五世将捐赠金提高到每年6000库鲁扎多白银,但这笔捐赠仅持续了2—3年。到了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时期,捐赠金又恢复到每年4000杜卡特。另外,一些天主教地方教会也资助过在日耶稣会。葡萄牙艾沃拉(Evora;葡萄牙城市)地区的主教曾捐赠500库鲁扎多白银给日本教会。教会人士佳斯帕·维加斯(Gaspar Viegas)个人便捐赠了1000库鲁扎多白银。探险家费劳·门德斯·平托记载道:“如果有钱人加入耶稣会,入教时需支付3000—4000库鲁扎多白银的会费。”^②平托和刘易斯·阿尔梅达(Luis Almeida)刚入会时,确实捐赠了一定数量的物资和金钱^③(阿尔梅达于1556年

加入日本耶稣会,入会时他捐赠了4000—5000库鲁扎多白银)。还有一位匿名的欧洲神父以个人名义捐款给耶稣会,据说他本打算用这笔钱在巴开姆(Bacaim)购置地产,但听说在日耶稣会经费紧张,于是将这笔钱寄往日本。另外,信徒迪奥哥·布兰道(Diogo Brandao)于1609年加入耶稣会时,也捐赠了一定数量的金钱。

对于在日耶稣会来说,获得金钱捐赠最实际,因为这能有效地补充传教经费。但要真正收到捐赠,还面临诸多困难:首先,捐赠金被汇到日本需要很长时间。无论从里斯本到果阿,还是从马六甲到日本,距离都远。当年的经费可能要两年或多年后,才能被运抵日本。其次,从葡王塞巴斯蒂安到菲利普统治时期,捐赠金都要被扣除30%。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捐赠的4,000杜卡特也要被扣除30%。但相关史料未记载扣除原因。再次,由于远离欧洲,捐款被安全运抵日本,要经历各种“考验”。远洋航海存在风险,如果航船遭遇恶劣天气或被海盗袭击,这笔钱便“凶多吉少”。耶稣会每年都苦等经费的到来,他们生怕运送途中发生情况。1573年,葡船已经驶抵日本海,但却遭遇台风而失事。葡船的遇难对葡商、耶稣会打击巨大,弗洛伊斯说:“这对耶稣会是噩耗,因为船上有我们的生丝、捐赠金和贵重礼品。今年的经费肯定不够了。”^④1584年,从果阿出发的葡船在途中遇险,船上8,000库鲁扎多白银的捐赠金全部丢失。最后,葡王和教会是否每年拨出经费,值得怀疑,他们可以借口失事或其它原因敷衍在日耶稣会。瓦利格拉诺(另有翻译为范礼安)曾指出:“其实葡王从马六甲税收中拨出捐款非常困难,因为马六甲也不富裕。”^⑤实际上,马六甲提供捐款应该问题不大,只是他们不情愿而已。瓦利格拉诺承认,无论教皇还是葡王都不愿承担施舍者的角色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,葡王、教皇并不在乎这笔钱,相比欧洲教会的庞大开销,国王没有必要敷衍耶稣会。

在日耶稣会在亚洲还购置有地产。1565—1570年,在日耶稣会总计拿出18000杜卡特在印度买地。耶稣会将土地出租,筹得部分经费。在日本传教初期,印度地产的租金以及耶稣会买

易所得要占传教经费的 2/3 左右。1570 年以后, 耶稣会又购置了 4 处印度地产, 时间和地点分别为: 1570 年的卡拉佳 (Caranja)、1574 年的旁文 (Ponvem)、1577 年的康多提 (Condotim) 以及 1585 年的穆尔高 (Mulgao)^⑨。地产租金每年可为他们提供 200 库鲁扎多白银的经费 (另有说法, 印度地产每年可以提供 1, 200 杜卡特的经费)。由于印度租金也需长途运输, 所以经常不能被按时送到, 有时还会无故丢失。1581 年 10 月 25 日, 传教士佩德罗·戈麦斯 (Pedro Gomes) 向总部抱怨道: “如果我不写信给你们, 巡察使 (瓦利格拉诺) 也会写信。我要告诉你们, 印度地产的租金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这点收入在你们眼中微不足道, 但对我们意义重大。如不能及时收到这笔经费, 在日耶稣会将面临财政困难。”^⑩ 瓦利格拉诺也表示不满: “我们需要等待很久, 才能收到印度寄来的经费。”^⑪ 另外, 耶稣会在澳门还有两处地产, 其租金也用于日本传教。

二、在日耶稣会的生丝、黄金贸易

在日耶稣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与葡船、葡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耶稣会不仅传教, 还搞贸易。这种情况在欧洲、乃至其它葡属亚洲地区都不常见。

在日耶稣会参与贸易的主要原因有: (1) 对于在日耶稣会来说, 无论捐款还是租金, 被运抵日本都有风险, 都不稳定。1595 年, 瓦利格拉诺抱怨道: “在过去的几年中, 总共有 30000 杜卡特资金未能被运抵日本。”^⑫ (2) 基督教在日本迅速传播, 教众也越来越多, 传教领域日渐扩大, 教会开支也随之增加。耶稣会需要更多经费以保证传教顺利开展。虽然耶稣会可获得一定数量的捐赠金和租金, 但所有经费加起来仍然不足。耶稣会只能自食其力, 于是他们考虑参与贸易。传教先锋沙忽略也承认, 为了传教必须经商。(3) 日本是位于最东方的传教据点, 而葡王直接控制的亚洲地区并不包括日本。在日耶稣会很难长期稳定地依靠葡王、教皇的资助进行传教, 远离欧洲、印度是他们的财政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。在日本, 能直接提供帮助的是葡商, 但资助耶稣会并非葡商的义务, 商人的捐赠也非稳定来源。但正是由于耶稣会远离“大本营”, 反

而摆脱了教皇、葡王的约束。在日耶稣会俨然是一个独立组织, 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由自己决定^⑬。是否参与贸易, 他们自己说了算。16 世纪中期, 在日耶稣会已经开始尝试经商。耶稣会最早的贸易可追溯到沙忽略远渡日本之时, 马六甲当局送给他 30 桶胡椒, 作为活动经费^⑭。30 桶胡椒的总价值为 366 杜卡特, 运到日本后, 可卖得 1, 000 杜卡特, 利润有 634 杜卡特。1552 年 7 月, 沙忽略在马六甲写信给果阿总部, 希望在 1553 年 4 月前收到葡王、教皇的捐赠金, 因为 30 桶胡椒赚得的经费已经用完。由此看来, 耶稣会的“第一桶金”来自香料贸易。但是这笔经费不够用。

熟悉日本国情的耶稣会士一定知道, 日本人最喜欢的商品来自中国, 生丝是贸易中数量最大、利润最高的商品之一。葡商几乎每年都去日本搞贸易, 如果耶稣会能参与其中, 其所得利润算得上是笔稳定的资金。于是, 生丝成为耶稣会参与贸易的首选商品。早期传教期间, 耶稣会已经开始买卖生丝。据耶稣会的资料显示, 1556 年, 新入会的阿尔梅达上缴了 4000—5000 杜卡特捐赠金, 耶稣会用其中的 3, 000 杜卡特购得 90 担生丝^⑮, 这是他们最早进行的一笔生丝买卖。尽管澳门和欧洲方面认为此举违反了教规, 即传教士不得从事贸易活动, 特伦托公会还呼吁惩罚进行贸易的传教士 (重者开除出教会), 但此规定对远在日本的传教士鞭长莫及。生丝贸易的利润有力地改善了在日耶稣会的财政状况^⑯。阿尔梅达的捐赠金意义重大, 于是耶稣会一直用它作为生丝贸易的投资成本。

外山卯三郎记载道: “如果耶稣会每年售出 50 担生丝, 则可获利 1500 杜卡特。”^⑰ 从 1565 年开始, 在日耶稣会通过生丝贸易每年获利 4000—8000 杜卡特。日本丝价最高时, 可赚得 12000 杜卡特。1578 年以前, 耶稣会买卖生丝几乎没有数量限制, 贸易所得成为传教经费的主要来源。1578 年, 瓦利格拉诺和澳门议会签订协议, 在日耶稣会名正言顺地参与到澳门——长崎贸易中。耶稣会每年可从葡船贸易中分摊 (购买) 50 担生丝, 投资额为 3000 库鲁扎多白银^⑱, 贸易利润为 1600 库鲁扎多白银^⑲。澳门方面还规定, 如果葡商运来的生丝达到饱和, 耶稣会可再分摊 40—50 担。如果耶稣会不愿购买, 剩余生丝将运回澳门。因此, 耶稣会有时能分摊 90—100 担

生丝。但生丝贸易向来火爆，大多时候他们只能分得 50 担生丝。瓦利格拉诺还指出：“虽然耶稣会想获取更多份额，但葡商已经表示不满，能有固定的 50 担已经不错了。”^② 耶稣会的生丝贸易一直持续到 1614 年德川家康禁教。耶稣会在日本售出生丝的时间不受限制。当生丝被运抵日本后，耶稣会通常“按兵不动”。待（葡）商人们完成交易后，他们才开始出售生丝。因此，耶稣会经常在丝价最高时出手，以获得最高利润。也有资料显示，耶稣会此举迫于无奈。因为澳门方面为了确保葡船离开前，葡商能进行大宗交易，故而禁止耶稣会在同一时间出售生丝。不过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，耶稣会都能卖到好价钱。因为葡船一旦离开长崎，需要等待整整一年才有新的生丝。这段时间，日本生丝市场正好缺货，丝价自然会上涨。

对于在日耶稣会参与生丝贸易的行为，葡王和教皇态度暧昧，他们不鼓励、也不限制贸易。他们既不愿看到耶稣会的商业行为，也不愿承担他们的开支。尽管教皇明令禁止传教士参与贸易，耶稣会总部也不满日本传教士既扮演上帝又扮演财神，但（教皇）格里高利八世还是默许了此举。其理由是：“在日耶稣会进行生丝贸易属于慈善行为，而非商业行为。……此类活动（生丝贸易）准确来说并非贸易，因为贸易所得全部用在了传教上。”^③ 1582 年 2 月，耶稣会士克劳迪奥·阿奎维瓦（Claudio Aquaviva）记载道：“教皇清晰地告诉我，在日耶稣会此举并非贸易，仅是一种需要。”^④ 由于澳门方面不断抱怨，再加上教皇、葡王对传教士参与贸易抱有成见和疑虑（怀疑日本方面是否经费不足），1585 年教皇收回成命，禁止在日耶稣会经商。教皇、葡王保证每年拨款给他们，但此承诺并未兑现。于是耶稣会无视禁令，继续搞贸易。瓦利格拉诺还上书罗马教廷，表示不满。罗马教廷认为，如果限制他们经商，可能会影响日耶稣会的传教活动，而且禁令还不一定起作用，不如正式批准贸易。只不过教皇的代表阿奎维瓦告诫瓦利格拉诺，耶稣会的生丝贸易必须遵守“1578 年协议”，进货数量一定不能超出。1584 年，西葡国王也承认耶稣会买卖生丝合法，他授命果阿总督正式批准“1578 年协议”。国王认为：“日本传教士至今无法维持生活。日本有 500 名传教士，他们开支巨大。教会还需修建房屋、开设神学院及学校，他

们还有近 200 座教堂需要维护。”^⑤ 但在 1588 年，国王突然改变态度，下令禁止耶稣会进行贸易，并保证拨款给他们。国王认为，耶稣会的本职是传教布道，而非贸易。但王室经费迟迟不能被运抵日本，耶稣会只能继续买卖生丝，禁令变成一纸空文。外界对耶稣会参与生丝贸易大多持反对态度。澳门葡商一开始就反对耶稣会插足贸易，他们出于同情才勉强答应“1578 年协议”。当他们知道耶稣会还有捐赠金和租金后，便开始抱怨耶稣会的贪婪。除了葡商，耶稣会同仁也表示不满，他们认为贸易利润乃不义之财，这样的经费不能要。澳门耶稣会对同仁搞贸易公开表示反对，但非常讽刺的是，他们也在中国开展了类似的商贸活动。方济各会也对耶稣会参与贸易颇有微辞，他们认为，在日耶稣会同时扮演上帝和财神的角色，这是基督教的笑柄和耻辱，他们建议教皇按教规惩罚在日耶稣会。1567 年，葡萄牙指挥官弗朗西斯·博加（Francis Borgia）写信给印度总督，信中提到：“在日耶稣会不应加入贸易，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更有效的办法解决经费问题。”^⑥ 非议和批评并没有影响在日耶稣会的贸易活动。瓦利格拉诺反驳道：“我们也不愿意这样。我们可以随时放弃生丝贸易，但必须有人能够提供足够经费，这大概为 12,000 杜卡特。”^⑦ 瓦利格拉诺的反驳让批评者语塞，因为无人愿意承担日本的传教经费。瓦利格拉诺理直气壮地总结道：“如果我们放弃生丝贸易，就等于放弃日本的传教事业。”^⑧ 博克舍说道：“耶稣会虽然能从印度地产获得租金、从欧洲获得捐赠金，但他们的主要经费还是来自生丝贸易。”^⑨

除了生丝贸易，耶稣会还参与黄金交易。战国时期，大名们疯狂聚敛黄金，因为黄金体积小、价值高、易携带和保存。16 世纪 80 年代，瓦利格拉诺曾指示手下：“购买生丝后剩余的资金，请投资在黄金上。因为黄金体积小，不引人注目，不至于惹出麻烦。同时日本的黄金市场火爆，大名和商人都需要。其它杂货就不要再投资了。”^⑩ 1593 年 9 月，瓦利格拉诺寄信给耶稣会士戈麦斯，信中谈到：“葡船上除了我们的 50 担生丝，还有 20—30 个金块。金块不会引起麻烦，能够被秘密带入日本。每次带来的黄金数量不一，利润也时高时低。”^⑪ 在日本，黄金交易的利润确实很高。1592 年 11 月 6 日，瓦利格拉诺写信给欧洲总部，信中提到：“第二次去日本巡察

后,耶稣会将 3,500 杜卡特白银运到澳门,并将其换成黄金。这批黄金被运回日本后,获取了 3,100 杜卡特(白银)的高额利润。”不过他马上又强调:“这是日本从未有过的事,黄金的利润通常为 25%。”^⑧但传教士卡布拉尔认为瓦利格拉诺的说法仍然保守:“对在日耶稣会来说,只要想得到黄金就能得到。他们要进行黄金交易非常方便,而且利润至少达 30—40%。”^⑨据参与过黄金交易的传教士回忆道:“按照欧洲单位计算,一个金块重 12.5 盎司,其中国售价为 60—90 杜卡特,运到日本后可获利 50—60%。”^⑩

从以上资料来看,耶稣会确实参与了黄金交易。但有学者认为,耶稣会很少自己交易黄金,他们其实是黄金的运输者,进行黄金交易的主体是大名和日商。史学者保罗·约翰森认为:“日欧贸易中,耶稣会扮演了黄金(或金条)经纪人(bullion-broker)角色,长崎是黄金交易的总部。”^⑪约翰森的观点比较中肯,因为耶稣会仅买卖了少量生丝便招来众多反对和批评,如果再参与黄金交易,恐怕会招来更多非议。实际上,有关耶稣会参与黄金交易的资料并不多。黄金交易多为走私,数据统计起来很困难。所以,耶稣会可能参与过黄金交易,但他们并非交易的主角。更多时候,他们是为大名和日商服务。大名和日商为什么委托耶稣会交易、运输黄金呢?首先,如果大名通过葡商运进黄金,金价、运输费都高。如果让传教士办理此事,只需支付少量报酬,或支持他们传教即可。其次,在日本,葡商也不愿意过多卖出黄金。因为大名们经常压低金价,而且强迫葡商拿出黄金,葡商对此极为厌恶。欧洲金价也高,葡商将黄金运回欧洲,照样得利。如果葡商只运来少量黄金,日本人反而不满,所以干脆拒绝他们。再次,葡商默认了耶稣会参与黄金交易。因为大名对黄金的追求几近疯狂,葡商不能得罪他们,于是保持沉默。澳门方面只能适当地限制被运出黄金的数量。1590 年,澳门议会规定,运往日本的黄金总量必须控制在 6000 杜卡特以内^⑫。

要求耶稣会运进黄金的人主要是基督教大名。大村氏和有马氏都向耶稣会提出过要求,他们知道,耶稣会在进行生丝贸易,运输一些黄金应该没有问题。其后,大友氏也加入其中。1578 年以前,大友氏每年投资 3000 杜卡特,交易黄金^⑬。耶稣会对大名的要求倍感为难,因为大名

对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。1592 年,瓦利格拉诺指出:“耶稣会在日本的一个苦差事就是帮助大名交易黄金,我们充当了办事员角色。”^⑭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必须依靠大名支持,不能轻易得罪他们。瓦利格拉诺每年都想设法完成 6,000 杜卡特的黄金交易量,但大名们的要求远不止这些,6,000 杜卡特还不到他们需求量的一半。耶稣会曾明确表示不愿承担此任务,但他们的拒绝引起了大名不满,大名认为耶稣会忘恩负义。大名认为自己排除万难帮助耶稣会传教,而且从不向教会征税。现在,大名仅是要求运输一些黄金,如果连这点愿望都不能被满足,那证明耶稣会没有诚意。大名们指出,如果没有足够黄金献给最高统治者(织田信长或丰臣秀吉),他们的势力将被削弱,封地将被没收。如果能够传教的地区被换成野蛮(非基督教)大名来统治,继续传教根本就没有希望。基于这些理由和指责,耶稣会只能默默承担这项任务。

参与黄金交易对耶稣会产生了不利影响,他们被卷入了日本复杂的政治、军事斗争。在耶稣会的帮助下,基督教大名迅速聚敛财富。非基督教大名心生妒忌,更加反对传教。学者科那德·斯齐诺考尔认为:“耶稣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大名们的斗争中。他们帮助一些大名的同时,也削弱了一些大名。”^⑮这种情况在九州岛特别明显,在日耶稣会很难进行“单纯”的传教活动。同时,最高统治者也担心大名们财富剧增,定会责怪耶稣会。耶稣会也注意到风险,所以每次都尽量控制黄金数量。耶稣会曾表示,传教士们最希望黄金贬值,这样大名就不再需要黄金了。在黄金交易中,最辛苦、风险最大的就是耶稣会传教士了。他们经常往来于广州、澳门和长崎之间,到处搜寻和交换黄金。黄金体积虽小,但价值却高。如果运输途中遇到不测,他们无力赔偿。虽然耶稣会极不情愿地运输黄金,但每次完成任务后,总可得到一些报酬。要求耶稣会运输黄金的不但有基督教大名,还有非基督教大名。依照日本的习俗,求人办事必能得到回报。如果委托人地位高,酬金自然也高。初到日本的耶稣会不能理解这种习俗,但很快便适应了,因为他们也需要大名支持传教。如果耶稣会执意拒绝酬金,日本人反而会疑惑,甚至不满。

三、在日耶稣会的收支失衡问题及走私贸易

耶稣会进行贸易后,其传教经费得到了补充

和保障。但这是否完全解决了耶稣会的财政困难呢？对于此问题，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耶稣会的收支情况。

在日耶稣会的收入时增时减，每年经费不固定。相反，他们的开支却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，每年逐步上升。1580年，日本有基督徒（天主教徒）150000人、教堂200座、办事机构85个、兄弟会20个。1590年，办事机构增至136个，开支必须满足600名传教士所需。尽管耶稣会的经费来源很多，但几乎所有的资金都用于传教了。他们的开支主要集中在开设教堂、学校、医院、礼拜堂、神学院及印刷厂上。另外，修建和维护这些机构也需要钱。以京都南蛮寺为例，仅建筑费用就高达3,000杜卡特以上^⑧。另外，多数日本教徒出身贫困，需要被救济。被野蛮大名逐出领地的教徒更是一贫如洗。贫困教徒中，大部分为中老年人。如果耶稣会雇用他们，必须支付工钱（这一点与佛教寺院不同，到寺院工作的日本人一般为义工）。这些中老年雇工效率低下，耶稣会也不会强迫他们干重体力活。从某方面来说，耶稣会支付工钱更像一种施舍。为了弥补这部分雇工欠下的劳动量，耶稣会还需另外花钱，雇用青壮劳力。

据瓦利格拉诺估计，在日耶稣会一年的花费为10000—12000库鲁扎多白银，与欧洲教会相比，这点开销不值一提。瓦利格拉诺指出：“欧洲教会维护一所（教会）大学的费用与在日耶稣会一年的总开销差不多，可能还更多。”^⑨学者高濂弘一郎曾统计过在日耶稣会历年的活动经费，其具体数据为：1571年为2000杜卡特。1575年为4000杜卡特。1577年为6000杜卡特^⑩。1579年为6000杜卡特。1579—1582年（2年7个月之间），总共为32000杜卡特或者更多。1583—1587年，每年支出10000—15000杜卡特。1587年以后，每年约为8000杜卡特。1595年以后，每年约为12000—16000杜卡特左右。禁教令正式颁布后，每年约为10000杜卡特^⑪。

16世纪中期，耶稣会的收支基本持平。但到了16世纪后期，支出逐渐超过收入。据高濂

弘一郎统计，1586年，葡王拨款1000杜卡特，教皇拨款6000杜卡特，印度4处地产租金为1215杜卡特，全年合计收入为8215杜卡特。实际上，耶稣会并未收到8215杜卡特，有20—30%被扣除。通常情况下，每1000杜卡特要损失140—200杜卡特左右。所以，1586年在日耶稣会的实际收入仅5575杜卡特。再来看支出情况，当年下教区经费开支为3010杜卡特，丰后教区为3390杜卡特，京都教区为3300杜卡特，准管区长及三教区长经费为1600杜卡特，合计11300杜卡特。这样看来，耶稣会的收入仅为开支的1/2左右。另外，学者荷雷拉·罗德里格斯（Helena Rodrigues）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，下表是荷雷拉统计的“在日耶稣会1586年预算”：

在日耶稣会1586年预算表

1 来源

A:来自日本以外的收入		
资金来源	捐赠者	金 额（单 位：杜 卡 特）
皇室捐赠	国王塞巴斯蒂安	344
	红衣主教亨利（国王）	40
教皇捐赠	格里高利十三世	1600
	西克图斯五世	800
印度土地租金	卡拉佳	150
	旁文	84
	康多提	144
	穆尔高	150
房产来源	澳门租金	80
累 计	3752	
B:来自日本方面的资金		
来源种类		金 额
丝绸贸易带来的利润		1200
长崎港口带来的收入		400
累 计		1600
C:总收入		
来自日本以外的收入		3752
来自日本方面的资金		1600
累 计		5352

2 支出

A:日本以外的支出	
花销项目	金额
在葡萄牙购书、购买消息和其它开支	200
印度地产应交纳的各种税收	120

传教士需要的商品(酒、橄榄油和其它东西)		120
船费和交通费用		60
葡萄牙的行政管理费用		30
装修教堂费用		100
在澳门停留的费用和到日本的旅费,以及礼品费用		300
澳门—长崎贸易中的投资费用		144
累计		1074
B:在日本的支出		
地区	花费项目	金额
下方(Ximo)	5 处房子、5 个住处和 1 所神学院	1204
丰后	1 所学院、1 所见习所、1 所神学院和 3 个住处	1356
宫古(Miyako)	4 处房子、4 所学院、1 所神学院和 2 个住处	1320
耶稣会上层人物开支		640
累计		4520
C:总支出		
日本以外的支出	1074	
在日本的支出	4520	
额外支出	760	
总计	6354	

(数据来源: Helena Rodrigues, Local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Japanese Mission, Bulletin of Portuguese/Japanese Studies, Vol. 7,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, (2003), pp. 120—121.)

由上表可见, 1586 年, 耶稣会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资金为 5352 杜卡特, 但开支为 6354 杜卡特, 荷雷拉在开支方面的统计与高濂弘一郎的数据有较大出入。但即便以荷雷拉的数据为准, 开支也比收入多出 1000 杜卡特。这足以说明耶稣会的收支不平衡, 其财政经费明显不足。

由以上分析可见, 即使参与了合法贸易(生丝、黄金), 耶稣会也不能完全解决财政困难。他们不得不加入走私行列。有学者将耶稣会进行的走私贸易称为“隐匿贸易”。1584 年 12 月, 耶稣会总部收到澳门议会的信件, 信中有道: “去年, 在日耶稣会违反了生丝协议。他们只应分得 50—100 担生丝, 但他们私下又收购 250 担生丝, 还有其它商品。我们对此感到愤怒。”^⑧ 瓦利格拉诺辩解道: “我们在日本的开支逐年增加, 但经费却在减少。我们不知道教皇已下拨款款, 故违反契约, 下令购买超额生丝。……今后我一定遵守协议, 在澳门、日本亦不再经营其它商品。”^⑨ 同时, 瓦利格拉诺立即写信报告总部: “正如我去年信中所陈述的那样, 所有协议之外的贸易都已被废止。”^⑩ 不过, 在日耶稣会的走私贸易并未停止。瓦利格拉诺于 1595 年 11 月写信给总部: “卡布拉尔在日本任布教长时, 一直在走私。除了生丝, 还有黄金、水银、铅和绸缎。其贸易获利在 30000 杜卡特以上。”^⑪ 1595 年, 果阿总督下令: “除了合法葡商, 任何人不得私自

买卖生丝。”^⑫ 法令不但针对走私葡商, 还针对耶稣会。有资料显示, 耶稣会还偷偷参与西班牙对日贸易, 此举引起马尼拉总督和国王的不满, 葡商对此更是强烈批评。实际上, 在日耶稣会一直不满澳门分配给他们的份额, 他们认为生丝太少, 贸易所得利润无法填补传教经费。在日耶稣会也曾提出: “我们早就想更改协议, 希望每年保证 90—100 担生丝。此外, 再进行一些其它买卖。”^⑬ 但澳门葡商决不让步, 严格按协议分配。1596 年 12 月 17 日, 卡布拉尔寄信给耶稣会总部, 揭发在日耶稣会在印度的走私活动。对于这次走私贸易, 瓦利格拉诺没有否认。1596 年 12 月, 瓦利格拉诺写信给欧洲总部, 进行解释: “我们在印度从事贸易, 是为了筹措去中国传教的费用。”^⑭ 1598 年, 瓦利格拉诺授意教徒走私一批黄金到印度, 果阿总督将此消息泄露。对此, 耶稣会(欧洲)总部严厉批评瓦利格拉诺, 认为这种行为不道德, 甚至是一种犯罪。阿奎维瓦提醒头脑过热的手下(在日耶稣会): “任何贸易都是教皇考虑到情况特殊时, 临时准许的, 并且在日耶稣会只能进行生丝贸易。如果罗马教廷和马德里法庭都认定在日耶稣会走私, 那么你们将无法进行任何贸易。”^⑮

耶稣会参与了合法贸易, 进行了走私贸易, 再加上各种捐赠金和收入, 他们的财政收入应该不错, 但收支不平衡问题一直未能解决。16 世

纪末, 耶稣会的财政状况还是没能改善, 甚至有加剧的趋势。1586—1600 年, 由于种种原因 (最主要是日本侵略朝鲜), 葡船有 4 次没有到达日本, 也就是说耶稣会有 4 年时间 (非连续 4 年) 不能进行生丝贸易。1590 年 8 月, 在日耶稣会指出: “我们必须搞些商贸活动, 贸易所得再加上其它资金, 我们的总资金才接近 10000—12000 杜卡特。其中的 3000 杜卡特用于维护教堂、修道院和神学院等设施, 以及购买绢织物、棉织物和毛织物 (制作教服)。其余资金要购入 50 担生丝和其它商品, 所获利润用来补充活动经费。”^⑨ 实际上, 耶稣会在 1590 年的总收入为 7700 杜卡特, 但开支预算为 10000 杜卡特^⑩。在日耶稣会要正常运转, 就必须精打细算和节俭开支。17 世纪初, 日本开始禁 (基督) 教, 耶稣会的财政状况更是难以改善。从 1597 年起, 教皇的资助也暂停了, 这让耶稣会总共损失了 50000 库鲁扎多白银。再加上葡船贸易时有时无 (日葡贸易在 1601、1603、1607、1608、1610 和 1613 年均未能开展), 在日传教士的生活可谓窘迫。

在这种情况下, 在日耶稣会唯有通过贷款来解决问题。1602 年, 耶稣会向日本人借款 4, 000 库鲁扎多白银。1603 年, 大船长冈卡诺·罗德里格斯·德·苏萨 (Goncalo Rodrigues de Sousa) 的葡船失事, 耶稣会面临困境。家康德知消息后, 施舍了 350 两白银给耶稣会, 并借给他们 5000 两白银。教会人士乔·科伊尔霍 (Joao Coelho) 在 1609 年提到: “如果澳门葡船不来日本, 我们就不能买卖生丝。照这样下去, 传教将无法开展。因为耶稣会已负债 20000 库鲁扎多白银。”^⑪ 1610 年, 大船长安德烈·佩索阿 (Andre Pessoa) 的葡船被毁, 耶稣会损失 30000 库鲁扎多白银, 这次损失加上以前的欠款, 在日耶稣会总欠款达 22000 库鲁扎多白银。

不过, 所有损失和欠款在 1614 年都变得无关紧要, 因为这一年家康决定彻底禁教。虽然一些学者从宗教、政治方面分析了基督教被禁的原因, 但少有人从经济角度考虑其中原因。从以上分析来看, 耶稣会的收支不平衡已经成为他们传教的重大障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 耶稣会就不该参与商贸活动。虽然耶稣会通过经商获得了资金, 解决了燃眉之急。但葡商开始对耶稣会表示出不满, 教会也对他们进行谴责, 传教士们还被卷入到日本大名的政治斗争中。即便在日耶稣会通过贸易获得了有限经费, 也未能彻底解决收支

不平衡问题。贸易受挫后, 耶稣会又大量贷款。久而久之, 欠款问题让本来支持传教的大名、商人失去了信心。

(责任编辑: 若火)

- ① 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—1650*, Manchester: Carcanet Press, 1993, p. 115.
- ② Malyn Newitt, *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, 1400—1668*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4, p. 146.
- ③⑤⑦ 外山卯三郎:《南蛮船贸易史》, 东京: 东光出版株式会社 1943 年版, 第 333、332、332 页。
- ④ Charles Borges, *The Economics of the Goa Jesuits 1542—1759: An Explanation of Their Rise and Fall*, New Delhi: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, 1994, p. 53.
- ⑥⑦⑧ C. R. Boxer, *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*, Macau: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, 1988, p. 45、37、58.
- ⑧⑩⑪⑫⑬⑭ Helena Rodrigues, Local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Japanese Mission, *Bulletin of Portuguese/Japanese Studies*, Vol. 7,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, (2003), p. 119、119、119、119、115、123.
- ⑨⑪ 高濂弘一郎:《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》, 东京: 岩波书店 1993 年版, 第 72、77—78 页。
- ⑭《岩波讲座日本历史·9 (10)·近世 1 (2)》, 东京: 岩波书店 1975 年版, 第 201 页。
- ⑮⑯⑰⑱⑲ 高濂弘一郎:《キリシタン时代の研究》, 东京: 岩波书店 1977 年版, 第 460、265—266、558、557、177—181 页。
- ⑳ C. R. Boxer, *Fildalagos in the Far East 1550—1770*, Hague: Martinus Nijhoff, 1948, p. 169.
- ㉑ 博克舍认为: “生丝的中国进价为每担 90 杜卡特, 日本售价为每担 140 杜卡特, 利润较高。不过耶稣会还需交纳 10% 的货费和 3% 的其它税。因此, 每担生丝的利润大概为 30 杜卡特。”参见: 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—1650*, p. 39.
- ㉒ 另说, 如果葡船运来的生丝超过 1, 500 担, 那耶稣会可分得 80 担。参见: R. Montgomery Martin, *China; political, commercial, and social;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's government*, Vol. 1, London: Brewster and west, 1847, p. 316.
- ㉓③ Paul Johnson, *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*, Clearwater (Florida): Touchstone Books, 1980, p. 417、417.
- ㉔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—1650*, p. 118、117、120、120、39、114、119、117.
- ㉕ 桑贾伊·苏布拉马尼拉姆:《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1500—1700: 政治和经济史》(何吉贤译), 香港: 郎文书屋 1997 年版, 第 270 页。
- ㉖②③④⑤⑥⑦⑧ 高濂弘一郎译:《イエズス会と日本》, 东京: 岩波书店 1981 年版, 第 602—603、104、158、332、336、293、209 页。
- ㉗⑨ 高濂弘一郎:《キリシタン时代对外关系の研究》, 东京: 吉川弘文馆 1995 年版, 第 243、241 页。
- ㉘ C. R. Boxer, *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—1650*, pp. 111—112.
- ㉙ Conrad Schirokauer, *A Brief History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*, Belmont (California): Thomson Wadsworth, 2006, p. 133.
- ㉚ 五野井隆史:《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》, 东京: 吉川弘文馆 2002 年版, 第 109 页。
- ㉛ 李小白:《信仰·利益·权力—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》, 吉林: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9 年, 第 78 页。
- ㉜ 高濂弘一郎译:《イエズス会と日本》, 第 209 页。
- ㉝ 高濂弘一郎译:《イエズス会と日本》, 第 34 页。
- ㉞ Helena Rodrigues, Local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Japanese Mission, *Bulletin of Portuguese/Japanese Studies*, Vol. 7, p. 121.